

# 辛亥革命与山东社会变迁研究

##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刘大可

(山东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提升了国民的民主主义意识,民主共和的观念渐入人心,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初步转型,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这一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辛亥革命引发了中国社会变迁进一步深化,山东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媒体、区域城市、市民生活、社会空间等领域受此影响,均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趋向现代化的嬗变,虽新旧杂陈、震荡、更新、失衡、重组等现象纷至沓来,但社会整合面临新的契合点,内忧外患下社会演进有了新的契机,引导着民国时期山东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辛亥革命; 山东;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1)05-0001-13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11 年(农历辛亥年)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脱离清廷。山东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的影响和全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一度倡导和促成了山东的独立。尽管后来受到袁世凯的镇压和各种势力的破坏,山东被迫取消独立,但山东同盟会员仍然不屈不挠,相继发动了烟台、登州(蓬莱)、黄县、文登、荣成、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地的起义,促成了烟台山东军政府的建立。山东的独立及各地起义,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成为整个辛亥革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革命也对山东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中国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特别是变法维新、清末新政以来社会整体转型的继续,而辛亥革命更加促进了这一转型的深入和加速。作

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人统治;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扫除了中国社会近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激活了社会内部因素与西方文明效应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诸多因子,社会演变得以提速。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教育、思想观念、区域城市、乡村等诸多领域,其结构与体制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所显示的变迁和转型带有整体性特征。革命的急促和突发,使得山东区域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不平衡性、复合性和缓慢性的表征。新社会元素不断增长、传统社会基本结构依然存在,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社会整合面临新的契机,山东的社会变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 一、政治变革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必备前提——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革命期间及此后一段时间里,立宪派、革命党人、旧官僚、开明绅士趋于互动联合,导致政党政治兴盛一时,但旧有基础(社会结构、强权政治、传统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存在,政治变迁充满了动荡、失衡、重组(复辟帝制、战乱不止等),山东社会政治

收稿日期:2011-04-02

作者简介:刘大可(1956-),男,山东日照人,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山东区域史研究。

出现多元化利益结构、多层次社会结构的趋向。

### (一) 政党政治的勃兴与式微

政党制度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代替封建专制君主制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为各派政治力量搭起了一座新的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各种党派纷纷成立,各党派在山东省的地方组织也空前活跃。几乎所有政党都在山东建立了地方组织,其中主要有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进步党等几个党派。

国民党是由同盟会演变而来的。同盟会的活动合法后,徐镜心、丁惟汾、刘冠三等省内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在济南成立了同盟会的公开组织,徐镜心被推为山东分会会长,刘冠三为副会长,积极发展会员,进行政治活动。1912年8月,经孙中山同意,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国民党。8月12日,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各同盟会支部征求意见。山东支部会员表示坚决支持,并立即组成了以徐镜心、丁惟汾、庄陔兰、刘冠三等为成员的国民党山东支部,徐镜心任理事长,丁惟汾任党务主任。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山东地方组织除积极从事议会政治外,还积极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乃至“五四运动”,是山东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势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袁世凯的不安。为与革命党人相抗衡,袁世凯纠集统一党、民社党、国民协进会等几个小党派合并成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等为理事,本部设在上海,各省设支部。其成员主要包括旧军人、旧官僚和立宪党人。该党标榜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共和党成立后,原山东咨议局中的立宪派等官僚政客在1912年5、6月间组织了共和党山东支部,由布政使王丕煦主持,主要成员有丁世峰、侯延春、周树标等人。

1912年3月2日,共和党由章太炎、张謇、熊希龄等人将中华民国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统一党,总部设在上海,以章太炎等为理事,其宗旨是统一全国建设,巩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1913年3月,统一党山东支部在济南成立,推周自齐、靳云鹏、张鸣岐、龚积柄为名誉部长,夏继泉为部长,潘复、庄陔兰为副部长。因该党党员多是各级在职官僚,所以被人们称为“官僚党”。统一党势力庞杂,成立时,除为数不多的立宪派人物外,其余成员多是共和党和国民党的跨党党员,没有形成较大的气候,但夏继泉、潘复、靳云鹏、龚积柄4人“对于后来山东政局的影响较大、较久”<sup>[1] [P123]</sup>。

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的首领汤化龙、林长民等发起成立民主党,9月27日正式成立于北京。干事长为汤化龙,幕后主持人则为梁启超。民主党的领袖群体,大部为旧立宪派人,虽然较有理想,出身与统一党和共和党的领袖群相同,彼此容易接近。民主党成立后,发展势力于各省,各地支部及交通部达七八十处。<sup>[2] [P102-107]</sup> 1913年4月,民主党山东支部宣告成立,由于铭阁主持支部工作。民主党缺乏势力基础,党员很少,并未形成大的影响。

袁世凯本想让共和党作为御用政党,与国民党抗衡,但由于共和党的党员多系政客,除争权夺利外,并无其他本领,无法与国民党相抗衡。于是,袁世凯又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1913年5月19日,三党合并大会在北京召开,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为理事,总部设在北京,各省设支部。根据各党总部的精神,三党山东各支部于1913年5月22日联合成立了进步党筹备事务所,由三党各推筹备员1人,具体商讨三党合并事务。7月6日,进步党山东支部宣告成立。合并后的进步党设理事6人,王丕煦为理事长。

从此,在山东遂形成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对立的局面。后来进步党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趋于瓦解,国民党在1919年10月与中华革命党统一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成立政党、团体、挂名党籍成为一种时髦。这些政团多打出“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的旗帜,并借此互相攻讦,鼓动群众,以壮声威,多少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些许征兆。这种混乱的资产阶级政党分合,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且基本上没有实际军事力量,所以其存在和发展不得不依附于北洋军阀,成为御用的统治工具。革命后执掌地方政权的军事将领或行政官员,大多发迹于晚清帝国没落而地方主义兴起之时,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牺牲地方利益为代价而同中央政权进行有效合作,他们更多是利用混乱的资产阶级政党分合,建立和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强固自己的力量,在纷乱繁争的政治争斗中纵横捭阖,保持胜率。

各党派踊跃参与政治活动,其深度和广度则为中国近代以来所未有,当时和以后都成为军阀专制统治的障碍,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局的发展,给社会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参加党派活动的成员中,有革命党人,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目的各有不同,政治品格高下有别,但均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对建设共和国抱有美好的愿望。这说明,当时社会各阶层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社会时尚和思想观念较前已有了很大改变。

### (二) 地方政制的变化

省议会的设置、变化与作用。民选立法机构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山东立法机构为省咨议局。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和绅商学界在济南集会,11月7日宣布取消咨议局,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作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区的最高机关,以夏继泉为会长。11月16日,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改为正式议会,以夏继泉为议长。省议会仅存在了一个多星期,就因孙宝琦取消山东省独立而遭到取缔。1912年1月9日,山东抚院饬令恢复咨议局。3月18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组织拟定省议会选举办法,山东省咨议局退出历史舞台。

1912年7月,同盟会会员、时任山东提学使司学务公

所视员的王朝俊,联络其他视员(全省共有视员10人,旧行政区每府1人)成立“十府同乡会”,由同乡会每县推举一名议员组成临时省议会,以张映竹为议长,刘冠三、王讷为副议长。

1912年9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省议会议员选举法》,随后又相继公布了《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省议会议员复选区表》和《省议会暂行法》3个法规,对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和省议会的组成等相关问题做了明确规定。省议会议员采取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先由选民选出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选举省议员。选民资格是以财产和科举功名为标准。除了清朝的廪生、增生、附生、秀才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其他人必须拥有不动产或动产500元以上者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北京政府时期,山东省共有3届省议会。第一届省议会于1913年2月27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张公制为议长。第二届省议会于1918年9月12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郑钦为议长。第三届省议会于1923年1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宋传典为议长。

山东虽然建立了省议会,但行政长官并非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委派。选民和议员资格的确认以财产、功名和学历为必备标准,下层平民不仅不能充当议员,甚至连选举权也被剥夺。这种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较晚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虽有所进步,但与议会民主制度仍有相当距离。并且由于在议会中各党派唯党是争,互相抵制,多数议案无法通过,省议会成为发泄私愤的场所。

尽管山东省议会从一开始就被军阀政客所操纵,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但议会政治的建立毕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宝贵尝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追求。山东省议会的建立对山东民主政治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山东省议会除在第一届任期内依法审议了大量议案外,第二届议会提出了两项重要弹劾案。一是对张树元的弹劾案。张树元任山东督军期间,贪污军饷300多万元。1919年12月下旬,议会经周密调查,掌握了张树元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的大量材料,对张提出弹劾。张树元最终被弹劾去职。二是对屈映光的弹劾案。1920年8月间,议员万光炜调查出山东省省长屈映光贪污有据的七大款,提案弹劾。屈映光也终被弹劾去职。另外,山东省议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作为民意机构的职权。1917年5月22日,山东省议会议长张公制等及绅商学界代表在济南面谒督军张怀芝,不该联名呈请解散国会,干预宪法。1917年7月5日,山东省议会通电反对复辟。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山东省议会多次发表通电,力保山东主权,废除卖国条约。1920年3月12日,山东省议会坚决反对关于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1921年5月4日,省议会揭露了山东财政败坏真相,除向田中玉提出质问外,还电请总统、

国务院严查。1923年11月4日,山东省议会致电各省议会,指出英国强租之威海卫,应期满收回。<sup>[3][P217-220]</sup>

总之,议会政治作为山东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存在及其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生长的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其发展和完善则有赖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有赖于国家的真正独立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民众政治素养的提高。

省级行政机关的设置、变化与施政状况。1913年1月以前,省级行政机关实行军政合一,都督为一省最高军政首领,都督府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1913年1月8日,袁世凯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宣布各省实行军民分治,规定民政长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设置行政公署,山东省都督周自齐兼任山东省民政长。民政长的职权是“以现行法规之例行之”,属于中央各部总长主管事件,在山东省区范围内“得临时委任”省民政长办理。<sup>[4][P324]</sup>实际上,“军民分治”后,地方行政长官也多由地方军政长官兼任。在北京政府统治山东的17年中,7任军政长官,有5人兼任民政长官。其中周自齐以都督之职兼民政长,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以督军之职兼省长,张宗昌以军务督办之职兼省长。5人中除周自齐外,其他均为军阀人物,未兼任地方行政长官的2人靳云鹏、郑士琦也都为握有重兵的实力派人物。

与此同时,省级各专职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废除都督府时期沿用的布政使司、提法使司、提学使司等清末旧制,在省行政公署之下设置总务处和内务、财政、教育、实业4司。各处司均以民政长的名义执行公务,不独立对外。

除上述1处4司外,山东提法使司改组成山东省司法筹备处,直属司法部,负责全省的司法行政事务。司法筹备处处长由司法总长委任,受省行政长官监督。1913年4月,原山东外交司改组为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公署,省交涉署承外交总长之命办理全省外交行政事务,并受省行政长官监督。

另外,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和山东省高等检察厅均予以保留。山东省高等审判厅成立于清朝末年,直属司法部,其职权包括两个方面:司法权和司法行政权。1913年10月,山东省司法筹备处撤消,其相应职权划归高等审判厅。山东省高等检察厅成立于1910年12月,直属司法部,按规定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职权分司法权与行政权两个方面。

1914年5月23日,北京政府颁布《省官制》,对省级行政机构的组成进行了新的调整。《省官制》规定,省置巡按使,取代原民政长,为一省民政长官,管辖全省民政及巡防警备部队,并受中央委托,监督财政、司法行政及特别官署的行政事务。根据《省官制》的要求,山东民政长蔡儒楷改任山东巡按使,裁撤原行政公署及所设置的各处、司,置巡按使公署。巡按使公署为省最高行政机关,内设政务厅,管辖总务、内务、教育、实业4科。另外,在原行政公署财政厅的基础上组建山东省财政厅,隶属

于中央政府财政部,并受巡按使监督。

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将各省巡按使改为省长,巡按使公署改为省长公署。9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和《实业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增设教育厅和实业厅,省长公署政务厅内的教育、实业两科予以废撤。其中,政务厅为全省行政枢纽,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为中央派驻山东的直辖机关,但受山东省长的监督。1918年1月23日,增设全省警备处,负责省内警务。1920年,设立山东省省长公署参议会,参议员额定为26人,由省长聘任,会长由省长自任。参议会主要承办省长交议事项、参议员建议事项及编辑事项。至此,山东省省级行政机关的设置基本稳定下来。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928年4月北京政府在山东统治的结束。<sup>[3]</sup> (P186-189)

辛亥革命后,虽然北京政府推行“军民分治”,以防地方势力坐大,避免出现地方割据的局面,但实行“军民分治”后,山东的地方行政长官还是多由地方军政长官兼任。这些兼任地方长官的军政长官,不仅把持地方军政、行政大权,而且独揽地方财政大权。各派执掌山东大权的军阀人物,极端看重财政税收,借以保障稳固统治的各项费用特别是军费开支,控制地方经济。这些军阀出身的地方长官,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先后统治山东的军阀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张宗昌等,为保持独据一省的地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各自为政,扩充军备,控制田赋、货物税,任意加派各种捐款,任意截留中央专款,减少甚至拒交协款、内外借款等。

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城、镇、乡自治组织机构。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对省级以下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废除清末府、州建制,改为省、道、县三级制,减少了行政层次。

根据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取消地方政府的府、州建制后,道成为地方一级的行政实体。各道员改称观察使,置观察使公署,公署内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4科。同时将道级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济东泰武临道、兖沂曹济道、登莱青胶道改为岱北道、岱南道、济西道、胶东道。1914年5月23日,北京政府颁布《道官制》,按规定,山东各道观察使一律改称道尹,观察使公署改称道尹公署,公署内部的机构设置与职能未作变动。6月2日,北京政府公布各省直辖道区域表,山东省原岱北道、岱南道、济西道相应更名为济南道、济宁道、东临道,胶东道名称不变。1925年10月22日,山东省长张宗昌将山东道级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将原来的4道改建为11道,分别为济南道、东昌道、泰安道、武定道、德临道、淄青道、莱胶道、东海道、兖济道、琅琊道、曹濮道,11道的行政区划设置一直延续到1928年4月北京政府在山东统治的结束。

根据北京政府《划一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山东的县级行政区组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首先,将各县行政区长官一律改称县知事,其行政机构则改称县知事

公署。其次,按规定,裁撤原来的府、直隶州和散州的建制,改为相应的县建制,全省由原来的96县改为107县。第三,根据1914年5月23日北京政府公布的《县官制》的规定,山东各县知事公署废除清末旧制3班(皂班、壮班、快班)和6房(吏、户、礼、兵、刑、工),设置总务、财政、民政、司法4科,另设劝学所和警察所作为管理全县教育和警政的行政机关。1920年,增设劝业所。1923年,将劝学所和劝业所分别改为教育局和实业局。此后,县级行政机构直到北京政府垮台未作变动。

北京政府在县以下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试行条例规定:每县设4至6区,分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县以下为社会自治组织城、镇、乡。城、镇、乡同级,都是县以下的自治组织机构。三者的区别主要是沿袭清朝光绪年间颁布的《城镇地方自治章程》的规定,城指府厅州县所在城厢地方;镇指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村庄屯集地方;乡指人口不满5万人的村庄屯集地方。

### (三) 地方军阀割据的形成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权,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权性质,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仅仅91天,但继起的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与其存在一定的沿续关系,因而也就不能不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政权性质。这一政治体制的变化使地方官制也随之出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作用主要是原有封建专制束缚的削弱,创办实业浪潮的兴起,民间资本的膨胀和发展。在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未能解决并且又有所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北洋军事集团力量的加强。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尚可协调之时,社会仍能处于一种基本稳定状态,反之则战乱不止,社会动乱不堪。

北洋军阀产生于清末中央政权弱化、地方势力抬头之时,辛亥革命给予了这一政治——军事集团发展的机遇,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使之最终形成。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与古代军阀不同的是具有资本主义的某些色彩,因而势力也就比较强大。他们打着“富国强兵”的旗号,采用西方国家的装备和军制,大量招募破产农民和其他民众,不仅依靠田赋,还将关税、盐税、官办企业收入、甚至发行国内公债举借外债,作为军队饷源,形成各成一派、各居一方的较为稳固的军事团体,成为民国以后十几年左右中国政局的主要力量。拥有一支军队、占据一块地盘,便能够掌握政权;地方军阀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便企图掌握中央政权,掌握中央政权之后又妄图当皇帝或总统,反过来又必须遏制地方军阀,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军阀心目中的理想之路,也是造成民国以后军阀之间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的原因。以小站练兵起家、最后掌握了北洋军阀的袁世凯,上台伊始为改变各省都督拥有一省军政大权的局面,采取“军民分治”,1914年6月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立将军。此举未能达到中央强化对地方控制,以避免“历代藩镇之祸”的目的。名称虽

改,但与往日都督一样,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视巡按使“如前清督抚之于布政使”。这一体制弊端不仅对地方,而且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都有重大影响。掌握地方权力、代表地方势力和地方利益的地方军阀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在“保卫共和”旗帜之下,与北洋势力中的不同派系甚至革命党人结合成暂时的联盟,矛头直指“洪宪”皇帝,并使其迅速垮台。当然这种联盟不可能是长久的,他们的利益和取向各不相同,随之而来的便是群龙无首,各派军阀割据一方,独树一帜,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持和怂恿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角逐,连年征战,混乱不已。

继周自齐、靳云鹏之后拥有山东军政大权的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张宗昌等人,均曾以督军身份统治山东一年半至三年不等,前四人属于段祺瑞皖系军阀集团,后一人属于张作霖奉系军阀集团。他们是在政党政治向军阀政治演变过程中,以合法性的军人上台执政的。作为占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他们虽分属于一定的军阀集团,但掌权的根本原则是为自己的生存和扩张。为此,他们可以牺牲同伙乃至集团利益,为保存实力、抢夺地盘而大动干戈,也可以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军阀政治所引发的只能是政治混乱,社会出现的只能是以暴力、纷争和腐化为特征的政治衰败现象。他们巧取豪夺、强征强卖、化公为私,不遗余力地聚敛财富,或为自己所用,或为战事消耗,使社会产品造成极大的浪费,迟滞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军阀的政治行为就是追求专制政治、军事独裁,但其权力运用在主观上与客观上必然是有距离的,因为派系林立、实力悬殊,身后均有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背景,谁都想不受约束,谁都不能不受到约束,结果社会环境出现松动,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有所复苏甚至发展。

## 二、经济变迁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处于对外不平等关系之中,军阀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善,“工商立国”已成大势所趋,工商群体地位的提高和进取精神的不断培植,以及一战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山东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银行资本实力不断壮大,不仅表现为数量的扩张,而且呈现质量的提高(技术改进、产业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亦由于传统经济的强大和日本等列强资本的渗透,山东经济发展仍荆棘丛生。

### (一) 经济环境的改善

政府“工商立国”的倡导和各种法规及奖惩措施的决定。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善,“工商立国”已是趋势,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奖励工艺品章程》、《国家税及地方税法草案》、《工商保息法》、《商会法》、《商人通例实行细则》、《公司

条例实行细则》、《会计法》、《审计法》等。依据这些条例,北京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举措,如废除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依据上述法规条例,政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或强或弱的改革,这些制度都程度不同地在山东实施过,特别是在新技术的推广、优良品种的引进等方面,山东受益颇多。

示范场所的设立。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从美国购入脱字棉、金字棉种子,分发给山东黄河流域农民试种。山东省政府为此在临清设立了省立第一棉种试验场,专门从事由美国引进棉花的试种和选育良种工作。1921年,北京政府又在山东设立了3处棉种试验场。1922年至1924年,山东省实业厅连续3年大批引进美国棉种,分发给省内各地棉农,鼓励棉农种植。为加强省内棉种的改良与选育,省政府于1926年在齐东设立新的棉种试验场,不仅进行美棉的试种工作和培育,而且还从事中棉的棉种改良试验。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广,山东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30年代初,全省形成了3大产棉区,即鲁西区、鲁北区和鲁南区。棉田面积常年在700万亩左右,棉产大量销往外地和海外。棉花产量由1918年占全国棉花产量的7.1%,上升到1930年的24%。<sup>①</sup>

山东省政府在蚕桑改良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0年,烟台华洋丝业联合会宣告成立,聘请蚕桑专业人员,在胶东栖霞、文登、海阳、乳山、牟平等县实施柞蚕丝业的推广与改良工作。由于胶东地区适于柞蚕饲养,加上试验场无偿发给树种,蚕茧一直畅销不衰,所以,胶东地区的蚕茧改良和推广工作很快收到成效,并迅速推广到省内其他地区。与柞蚕业发展的同时,桑蚕业也在山东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桑蚕丝的主要产区为鲁中南的临朐、沂水、蒙阴、新泰、莱芜、博山等县,所产之丝,部分运至青岛、上海转销国外,部分销周村、张店,进行深加工。与棉花良种的改良一样,蚕桑的改良和推广直接推动了山东丝织业的发展。

### (二) 工商群体地位的提高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从“四民”关系上看,“士”为“四民”之首,农业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这决定了工商业者虽然具有经济地位,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辛亥革命前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大大增加。随着工商界队伍的壮大,经济实力的增强,工商业经营者开始通过组建同业公会或者商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对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开始从传统的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移动。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省咨议局,即允许实力雄厚的商人参与选举,成为咨议局议员。民国成立后,工商业者的政治权利继续提高,参政议政的机会增多。其中,宋传典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谋选为山东第三届省议会议长。

工商群体地位的提高与商会的设置有很大关系。清末,作为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商会组织在山

<sup>①</sup>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戊)1934年版,第188页。

东各地出现。新成立的商会已不同于旧式带同乡会性质的联谊组织和行帮互济组织,它打破乡籍和行业界限,实行各业工商业者的联合。清末出现的商会组织在民国初期进一步扩张,其性质也有所改变。据统计,1912年山东成立商会47个,1913年45个,各县基本上都有商会或商务分会组织。1914年9月北京政府公布《商会法》,规定商会为法人,是一个独立组织,为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1915年、1916年,昌乐、曲阜商会相继成立。截止1916年,在山东高密等地又成立商会19处。<sup>①</sup>在商会建立以前,工商界处于传统行会制度的控制之下,在外来因素渗透和威胁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商会成立以后,引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团体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各行各业纳入统一的社团组织之内和有序管理的轨道,减少了自身的内耗,增强了对抗抗衡的力量。商会成立后,负责向政府主管机关为工商业户办理开、转、歇业的申请、注册、备案等手续;在司法机关的支持下商会设商事公断处,负责调停处理工商业户的商事纠纷,并有权对争议者进行传讯、扣押和“公数”。同时,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1920-1921年济南商会参与抵制北京政府的开征所得税及加贴印花税的活动,致电北京政府,指出加贴印花“显系违法”,表示予以“一律否认”。通过商会加强各行业间的信息沟通和联系,也是商会的重要职能。济南商会成立后,针对在此之前工商界存在的行业壁垒、商情不通的现实,把加强工商业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络并通报有关商情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在地方上有影响和实力的社团,商会除侧重于“通商情、开商智、扩商权”,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更是通过被它控制的下属外围团体和与学务公所、教育会等文化教育组织人事的交叉渗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城市社会治安、市政建设、卫生防疫、文化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管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三) 工商各业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于民族工商业的热情,“民国初年,济南、青岛、烟台三埠,工业勃兴”<sup>②</sup>。新政府采取的众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因反对日本侵华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市场压迫的缓解,使山东的现代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经济规模显著扩大,经济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根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统计,1916年山东注册的工厂有31家,资本总额669万元,注册公司71家,当时山东的工厂和公司总数为785个,<sup>[5] P411</sup>大大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其他如农村商品经济、工场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国内外贸易等,无论是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考察,均有程度不同的发展。<sup>[6] P214-235</sup>

工业的发展。民国初期,山东工业经济有了较为迅猛的发展,投资设厂形成热潮。据统计,1911年开办的棉织企业为8家,1913年增加到63家,其中部分工厂采用机器生产。1915年山东第一家华商纱厂济南鲁丰纱厂开始筹建,1919年投产。同年,青岛华新纱厂建立。另外,各地还陆续建立了一些小型棉织厂和针织厂。青岛、济南、周村、福山等地有小型棉织厂200多家,其中青岛有针织厂6家,资本4.4万元。<sup>[6] P222</sup>1912年至1913年间,山东兴办的酿酒、制糖、榨油、火柴、制蜡、制烟和皮毛制革等各行业迅速增加,由333家增到476家。据农商部第二次统计表载:到1913年山东共有民族工业991家,职工34536名。这些工厂虽然规模较小,并且多为手工或机械生产,采用电动机生产的尚不普及,但却对改变传统经济结构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成为山东现代经济的基础。

就工业部门而言,民国初期投资创办的主要行业有棉纺织业、火柴业、丝业、玻璃业、榨油业、煤矿业,这些行业到20年代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它如酿酒、印刷、制糖、制革、食品罐头、制盐、制碱、铁器等行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比如铁工厂的发展,据统计,自民国元年至1920年,设立的各种铁工厂计有济南8家,青岛9家,博山5家,威海卫、济宁各4家,潍县3家,全省共33家。<sup>③</sup>山东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存在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下和市场不统一、不稳定等诸多不利因素,未能形成山东独立的工业体系,并且受到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势力的排挤,但设厂数目、投资规模和生产能力都比辛亥革命以前有了飞速发展,技术改进也不断深入,从而促进了山东地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

商业资本加快流动和集中。济南是山东政治和陆路交通的中心,民初经济秩序逐渐恢复和日本占据青岛以后,青岛、潍县、周村等地商业资本迅速向济南转移,出现了济南商业资本猛增的现象。据统计,1914年加入济南商务总会的会员达1800多家。此外,以家族经营为特色的商业资本集团仍在迅速扩展,形成了一种或数种商业的垄断地位。如章丘孟家商业资本集团,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经营土布、绸缎为主改变为经营洋布、呢绒、绸缎为主后,使“祥”字号在北京、天津、济南、武汉、青岛的绸布商业经营中,在北京、天津、济南的茶叶商业经营中均占据首要位置,从业人员达2800余人,堪称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民族资本。桓台苗家商业资本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沿津浦铁路沿线设立粮业商号30余处,1915年开始独揽山东到广东的粮食贸易,并形成山东生米业的垄断地位。另外还引进江苏、上海等地资金,开办面粉厂,以投资工业获取利润。

新式商业的崛起和城市商业的繁盛。随着外国商品

①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600-605页。

②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1934年版,第637页。

③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1934年版,第643-656页。

的输入和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扩大,农产品、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速度加快,形成了以新式商业为主或新旧商业并存的新兴商埠。这些城市或因是交通要道,或因是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交换中心,或因是对外贸易口岸,其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一定的商业区域经济内,往往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龙头,环绕其周围若干中小商业城镇,从而构成新的商品流通网络和经营格局。青岛、济南、烟台、潍县、济宁等城市在山东区域经済中都曾起过龙头作用。如胶济铁路通车的第二年(1905年),青岛经由铁路发运济南的商品货流量即达132600吨,由济南发运青岛的商品总量达162480吨。民国初期(1918-1920年),胶济铁路的年平均货运量已达170万吨。1918年度,济南经津浦路输出输入的货物已达近百种,输出入货物总量达24万吨。<sup>[7][P91]</sup>在市场不断扩大、风险因素增大的情况下,新旧商业在经营方式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新式商业内部组织严密,合理进行分工,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经理部,从事经营管理。并设置营业、庶务、会计等部门,具体分管商店的经营专卖、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严格计算盈亏,设有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民国初期,山东各口岸贸易经济的变化主要是:烟台港洋货进口进一步下降,土货出口有所增加。1915年出口即超过进口。清末民初,随着大批山东人移居东北,促使东北地区经烟台大量进口山东日用品和手工产品;同时,山东沿海和内地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烟台港对东北大豆、蚕茧的输入。此外,山东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粮食从东北经烟台亦大量入口。1910年津浦铁路津济段通车后,整个华北地区纳入青岛商务范围,使青岛港进出口贸易以13%的年平均增长率迅速发展,并很快超过烟台港成为仅次于天津的北方第二大港。青岛港进口洋货商品主要有布匹、棉纱、煤油、金属、火柴、染料、糖、针类、纸烟、绸缎等10大类,基本上是生活消费品;出口土货商品主要有草辫、茧绸、丝、花生、花生油、牛皮、铁矿石、小麦、煤、烟叶等10大类,基本上是经过初步加工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龙口于1914年9月辟为商港,初为官办,翌年6月改为官督商办。1918年9月动工修建码头,一年后竣工。随着开埠后来往船舶的增多,龙口商号由原来百余家增至300余家,港口进出口轮船和货物运输成倍增长。威海卫港进出口商业贸易虽有发展,但因一直被英国充作军港,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一时期发展速度远不及山东其它港口。

金融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在旧式钱庄、银号仍然大量存在的同时,资本主义的银行大量出现,金融资本日趋活跃。这类银行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国家银行,包括在金融活动中代表国家的银行,也包括受国家监督、执行国家金融政策的专业银行;一种是地方银行,包括地方政府设立或受地方政府管理的地区性银行;一种是商业银行,

包括以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为主要业务,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其中有兼营货币兑换、金银买卖、储蓄、保险、信托者。当时,济南是山东本土金融业的中心,1911年到1924年共设立官办和商办银行18家。其中,中国银行济南分行资本达800万元,交通银行济南分行资本达600万元。1912年8月由山东官钱局改组的山东银行资本总额500万元,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钱票等3种货币。1915年通惠银行、齐鲁银行以资本60万元和30万元相继开业。1916年中国实业银行济南分行以资本70万元开业。此后基本历年都有新设银行开业。这些银行开展存放款、汇兑、发行纸币、兑换货币、工商业贷款等业务活动,其经营范围和规模远非银号、钱庄可以比拟。在山东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货币流通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交通银行先后在烟台、峰县、德县、济宁、龙口等地,中国银行先后在青岛、烟台、滕县、济宁、周村、惠民、临沂、潍县、临清、泰安、桑园、龙口、掖县、胶县等地,山东银行在历城、青岛、周村、潍县、烟台、菏泽、章丘、长山、泰安、滕县、济宁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形成覆盖广大城镇的金融网络,为各地经济的发展演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村经济的变化。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给农村经济带来影响和冲击,促使其发生变化。进入民国以后,山东农村土地关系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大批官有土地通过各种形式变为私有土地;土地集中程度下降,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土地租佃关系逐渐松散,呈现下降趋势。

在国内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山东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农村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山东原已形成的商品化农产品区域性生产在民国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区域不断扩展,一是生产数量逐渐提高。棉花的种植获得了较快发展。在清末,山东的棉花种植仅能满足省内需求,民国以后,山东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逐渐发展到数百万亩,棉花产量在全国棉花总产量中的份额也急剧增长。如1918年棉花产量72.1万担,占全国总产量7.1%;1923年增至138.8万担,占全国总产量19.4%。<sup>①</sup>增加的棉花产量大量销往海外。根据青岛口岸的统计,仅1921、1922、1923三年自青岛港出口的棉花分别达9617担、30096担、44924担,出口的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北京政府统治末期。<sup>[8][P24]</sup>花生的种植,在民初以来,由胶东地区逐渐推广到省内其他地区,并逐渐形成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4大花生市场。全省花生种植面积常年在380万亩左右,产量超过1000万担。<sup>②</sup>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产品除满足省内需求外,还大量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北美和日本等海外地区。烟草种植面积在清末民初也有大幅度的增加,并形成了以潍县、安丘、益都、临淄、济阳等地为中心的烟草种植区。烟草种植面积

①庄维民《近代山东陆运商路》载《山东史志丛刊》1988年第1期。

②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戊)1934年版,第188页。

的扩大既受出口需要的刺激,也受国内消费增长的刺激。从出口方面来说,1870年出口仅4000担,1910年达到218000担,此后的10年间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sup>[3][P231]</sup>另外,山东蚕桑、麻、甜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民国以后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

山东经济作物的推广,使其产品纳入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这种变化在山东各地程度不同,一般说来,交通便利地区比较明显,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农村商品市场得到扩展,对城市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商品经济受到了外国资本的制约和盘剥,并随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程度而膨胀或萎缩。

辛亥革命后,山东经济还有一个明显特征,这就是外国资本、特别是日本资本的渗透。日本是较早进入山东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借对德国宣战攫取了其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加之山东是皖系军阀统治时间较长的省份,日本支持皖系而在山东获得了许多方便条件,随之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掠夺性经济开发,造成了山东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日本为确保在山东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采取直接企业投资、合办企业投资和借款等三种形式,谋求霸占山东的优势地位。日本根据山东物产资源分布状况进行投资设厂。日本为争夺原料市场和倾销商品,还在山东内地建立收购及销售网络。日本以投资工商业、包揽华商进口贸易为途径,加紧对山东的经济渗透,造成日商资本不断膨胀和华商资本相对萎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政体,为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扫清了许多障碍,开辟了诸多新的道路,因而在辛亥革命后山东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民族资本力量崛起。但由于军阀割据和军绅政权的形成,战事频繁发生和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存在及主导地位,国内市场的分割,资金匮乏及社会民众的普遍贫困,外国资本的渗透及对民族资本的冲击则对山东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 三、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山东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辛亥革命是民族觉醒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共和民主思想、“天赋人权”思想、科技救国思想、妇女解放思想引领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民众特别是社会精英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发生了改变。然而,历史的承继性又使民众陷于信仰危机和价值观混乱,读经尊孔再度兴起,儒家文化的优越感与西方文明的有效性形成的思想观念上的悖论,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勇敢、激进的姿态,对封建时代的旧文化、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批判,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一大批先进分子出于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积极从国外引进各种民主

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改造中国社会设计方案,鼓舞人们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生活而奋争。

#### (一) 山东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的思想宣传与社会影响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通过报纸、刊物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依据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法权学说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在理论上论证封建君主专制存在的不合理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明朗性。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解放人们的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后,王朝俊、葛象一、丛禾生、王祝晨、范铭枢、刘冠三、鞠思敏等山东籍老同盟会员、归国留学生、革命志士们,继续活跃在文化思想界,把推广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开启民智,巩固与拓展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作为改革中国社会的前提条件,并努力兴办新式教育。如王祝晨与刘冠三、鞠思敏、于明信等人于1913年秋,在济南大明湖畔创立私立正谊中学,进行新式教育;范铭枢在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在本县创办教育图书社,从事小学教育,继赴济南创办模范小学,后从事中学教育,历任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国文教员、济南师范学监,等等。<sup>[3][P252]</sup>

宣传与灌输“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政治理念是山东革命党人、进步人士新教育活动的根本内容之一。这些革命志士是推动新教育的主体,他们把学校办成民族复兴基地,把学生培养成兴国安邦之士,成为其直接的世俗化的基本诉求。同时,他们也是兼习中西、知识丰富、思想进步的学者。因而他们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激荡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重塑以科学的世界观为主导的“爱国、信义、忠诚、勤勇、耐劳、自强”的新国民及新国民性,并将这种新国民与新国民性作为刚刚进入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的物质基础与思想灵魂。他们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反对封建旧礼教,发展女子教育,提倡新文化。他们根据“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原则,按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精神,推行新教育。除中文等基础课外,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日语、英语等新课程也作为宣扬新文化的、小而具体的形式,以主课的面目出现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并程度不同地得到推广。学生德、智、体素质均有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sup>[3][P252-253]</sup>以菏泽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为例,该校1919年的两个毕业班56名学生中,考入大学者33人,而考取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者就达18人,占毕业生人数的1/3。<sup>[9][P279]</sup>

当时济南成为山东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革命党人王乐平从五四运动中感知到了思想宣传的巨大作用,因此在运动结束后不久,即于1919年10月在济南创办了齐鲁通讯社和《民治日报》,发行《十月》期刊,以宣传三民主义,启迪青年革命思想。1920年他又与聂湘溪、熊观民等人以齐鲁通讯社售书部为基础筹设齐鲁书社,向全省读者介绍和销售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如《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社会科

学大纲》、《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建设》、《解放与改造》、《国民》、《曙光》、《星期评论》等,促进了山东新文化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青年思想甚巨”。山东旅京大学生宋介、王统照、王晴霓、范煜遂、徐彦之等人接受新思潮的熏染,在京创办了《曙光》杂志社,刊载介绍苏俄的文章及列宁等人的著作译文,发表论述劳动阶级、阶级斗争、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等问题的文章,同时在济南、烟台设立发行代派处,以扩大影响。王林肯创办了《醒报》,自任社长,宣传新文化。<sup>[3][P268-269]</sup>教育界也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教师,如省立一师有刘次萧、孟民言、宋还吾、赵振之、张默生、蔡自声、孙东生、张乾一、杨晦(慧修)等。<sup>①</sup>另如省立三师的校长孙宝贤是“倾向革命的自由教育家”,教务主任刘少卿、训育主任李子斌“是五四后方自师大毕业出来的新学士”,历史教员孙备五、英文教员李可亭“均是痛恶军阀混战祸国的导师”<sup>②</sup>等等。在他们的鼓励影响下,青年们改变了以往那种安安稳稳埋头于故纸堆而“不去管社会怎样,人类怎样”的人生态度,普遍地“有了觉悟”,注意到除老实读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非常重大的关系,进而对从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了不满意,“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sup>③</sup>。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铭创办了《励新》半月刊,登载了大量关于山东教育和妇女解放及讨论社会改造问题的文章,通过具体事例剖析社会,抨击社会时弊,启发青年觉悟。于是,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关注社会生活,追求新的人生价值,建设理想社会便成为青年们共同的理念。

1919年12月23日的《晨报》曾评论说“济南有了一件很可观的事,就是有了所谓新旧之争,而第一师范就是争的场所,教员学生分为两派,持新主义的人数少而力量多。”这显示了社会思想深刻变化的激烈程度。

## (二) 报刊传媒创办及影响

辛亥革命后,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山东各种报刊蜂起,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首先,报刊所具有的新闻传递功能,使报刊能够传递各种社会信息,进行人与人之间、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社会各阶层各社团组织之间的交流,并及时反映国内及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能及时了解本地与外部世界甚至是全球各地的发展变化,这有利于社会由闭塞走向开放,由保守走向变革。其次,近代报刊多具有政治宣传功能。近代知识分子利用报刊的信息传播功能,撰文声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文化、新知识,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宣传教育。

辛亥革命后,山东出版了众多报刊杂志,如报纸有《山东教育报》、《晨光报》、《济南晚报》、《市民晚报》、《东鲁日报》、《诚报》等,杂志有《山东农工杂志》、《学生杂

志》、《工人周刊》、《现代青年》、《新山东》、《励新》、《沂源新刊》、《济南劳动周刊》等,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是宣传各种政治、文化思想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2年到1927年,济南先后出现各类报刊60种。进入1930年代后,济南的报纸数量有明显增长,1932年有17种报纸,到1937年已达20家。1930年代,济南的期刊杂志发展迅速,门类日臻齐全。现有资料表明,从1903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济南先后出版各类期刊杂志251种。其分布情况是:政治理论时事法律96种,财政经济24种,文化教育50种,工、农、青、妇、少年儿童类19种,文学艺术画刊19种,科学技术22种,新闻出版广播21种。<sup>[10][P341]</sup>

以学校师生为主体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创办了许多宣讲反帝反封建、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如山东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校报于1920年10月刊出了《灾民号》,省立一师学生自治会创刊了《沂源新刊》,励新学会在1920年12月创刊了《励新》半月刊,省立三师出版有《三师周刊》,等等。<sup>[3][P269]</sup>它们刊载了大量政论性文章,如社会政治方面有徐其昌的《我国衰弱尚有挽回的希望》,韩式仪的《新旧》,陈汝美的《自治》,孟宪栋的《刷新乡民思想的一个好办法》,范竹铭的《难民根本救济的研究》,滕耀宗的《警告新年的资本家》,邓恩铭的《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以及《克鲁泡特金的略传》、《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文化教育方面,有王尽美的《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于乡村教育的根本怀疑》、《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韩式仪的《年级制度与个性发展》,杨泰蜂的《我之白话文教授观》,王祝晨的《文化新介绍——文学号再版序》,陶士英的《学生自治的真精神》,吴瑞光的《国文必须改革的理由》,赵清廉的《国民教育腐败之原因》,于其惠的《新文化应该怎样提倡》;社会生活方面的有孙启贞的《男女为什么要平权》,赵锡绶的《妇女解放根本的问题》,李伯衡的《怎么还不拿女子当人呢》,赵振寰的《旧式婚姻的弊害》,王俊瑞的《女子装束问题》;科学思想与技术方面的有靳鸿训的《科学与宗教》,蒋宪朝的《桑苗之整理》,石毓菡的《种痘之利益》,刘菊华的《山东桑蚕业不发达的原因和将来补救的方法》,等等。论及问题涉猎之广,反映人们思想的活跃程度,也显示出进步人士思想变化的趋新之势。

中文报刊的出现,对居民社会生活、信息传递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很大。据统计,1930年代初,济南市民通过阅报栏、图书馆、教育馆等各种途径阅报的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1931年全市阅报人数共75785人,占全市总人口18.77%;1932年85295人,占19.94%;1933年的数字是104402人,24.08%。报纸作为现代大众传媒在居民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报纸获取各种

①褚承志《张宗昌的亚历山大与山东六专门的结束》,《山东文献》第2卷第4期,1977年3月。

②韩兆岐《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里的革命史料》,《山东文献》第1卷第3期,1975年12月。

③《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励新》第1卷第1期,1920年12月。

信息,阅报者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资料显示,在济南市图书馆1934年下半年的阅报人群中,有工人5859人、商人8942人、学生15871人、政府人员8585人、军人7038人、农民4675人、其他5009人。<sup>①</sup>可见,报刊的影响力之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载体难以企及的。

### (三) 封建迷信思想的突破和社会习俗的更新

封建迷信思想是阻碍中国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鬼神及其物化的神像的崇拜是当时大众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辛亥革命前,山东城乡民众迷信思想严重,具体表现在庙会之多,每月都有,尤其是妇女烧香拜庙的很多。很多地方的城隍庙会,轰动城乡八方,附近各县的群众烧香许愿、挂盘香等迷信的事情,不一而足。中元节(七月十五日)的前夕和冬除日(冬至)节前夕的家祭,清明节、六月六日、十月初一日,按时拜墓烧纸,除夕元旦还有许多禁忌。此外如祭灶(腊月二十三日、八月初三日)、祭张仙、祭北斗、焚老牛、焚升斗、焚册钱(三月初三日、九月九日)等等。

反对封建迷信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甚至提出,在军政时期要以革命武力扫除封建迷信对革命的阻碍。受此影响,许多青年国民党人也把反封建迷信视为其应尽职责,认为20世纪是科学时代,应当抓住革命时机,彻底打破迷信,认为革命党人的造反就是造封建军阀的反,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反,造愚民迷信的反。<sup>②</sup>因此,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为刷新社会,塑造新政权形象,在各地首先发起了拉神运动,军队、青年国民党人、知识分子到处拉神,将寺庙里的城隍、菩萨们拉倒、清除,改建为政府驻地或文教机关。如1928年,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范熙绩在长山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拆除神像、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并派兵取缔了以封建迷信从事诈骗活动的会道门组织“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sup>③</sup>同年6月,国民党泗水县党部成立后,也把拆除城隍庙神像作为其第一项施政措施,并在警察弹压下,将城隍庙神像强行拉倒。黄县的青年人则认为封建迷信反对科学,使人思想僵化,愚顽守旧,既妨碍建设,也影响社会进化,要破除迷信,非将庙宇内的偶像彻底摧毁不可。在县党部策动下,县中学生也发起拉庙运动,所有庙内神像悉被拉倒,弃之污水中。庙宇即改建为文教机关,设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馆阅览室,广置古今图书及名人字画,订购全国著名之报章杂志,供民众阅览。<sup>④</sup>拉神运动可视思想变化在城镇乡村社会的反应,辛亥革命后社会思想的变迁虽主要发生在城市空间内,但乡村社会的封闭性、落后性也开始触及,并不断深化。

辛亥革命在山东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旧的思想观念

与价值体系,创造了新的人文环境。辛亥革命后社会风俗有所更新,男女平等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人们不再激烈反对男子剪辫、女子放足,有的地方废除了旧的婚丧嫁娶陋俗,取消贴门神,换上新对联,废除旧历年,改行新历,等等。<sup>[11] P762-763</sup>辛亥革命后,族长的权势渐差,族众已不像从前俯首贴耳的服从,有时会起而争辩。

社会习俗的嬗变,一般具有渐变性的特质。革命时期突变性的出现,容易引发人们的不适和反复。社会风俗中反映价值信仰的方面往往又是凝固而相对持久,其替代性转换需要社会生活的持续变化和思想变化的不断深化,因此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常常交织在一起,激进、彷徨、恐惧等各种面相均会出现,并长期影响人们的生活。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思想意识变革仍受到传统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讲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 四、城市变迁

辛亥革命爆发于城市,因而对于城市的影响更加显著。辛亥革命后,山东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这不仅表现为城市数量与规模、人口、城市化率、社会精英、城市阶层的嬗变,更集中反映在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

#### (一) 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山东的城市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总体呈不断扩大趋势,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济南1909年的人口为246000人,1911年增加到275300人,年均增加9767人。此后,随着民族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逐年增加。1914年至1919年济南市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sup>[12] P202</sup>1929年,济南市区已达379549人,同1914年比,增加133571人,增长54.3%,平均年增8905人。1930年前后,由于济南工商业发展较快,人口流动量较大,迁入多于迁出,据1930年5月份统计,迁入4949人,迁出3303人,迁入比迁出高49.8%。1933年,济南人口发展到427772人,至1936年,全市人口增加到435136人,较1929年增加了55587人。可见,济南在辛亥革命后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sup>[13] P303-305</sup>

沿海商埠城市的扩展,主要是大量移民持续涌入的结果。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业人口。青岛的城市人口,1897年德国人调查全租借地内为83000余人。1911年,青岛人口减为54459人,到1921年人口又增至83700人,10年中增长了53%。1933年6月,青岛人口已发展到436772人,比1921年增加4倍多。烟台1862年开埠后,到1891年发展到32000多人,到1933年更发展到了139512人,比1891年增加3倍多。<sup>④</sup>此外,其他一些城市的人口数量增加也很多,如至1932年,威海的

①《市政月刊》第8卷7.8期合刊,1936年8月。

②乔修梁《为破除迷信拆城隍庙神像记》,《山东文献》第5卷第3期,1979年12月。

③李新铸《反动会道门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济宁文史资料》1987年第3辑。

④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4年版(丁)第9页;(丙)第12-13页,56页。

城市人口已达 195 630 人,潍县的非农业人口为 82 781 人,周村非农业人口为 56 620 人,博山的非农业人口为 37 563 人。<sup>[14] P660</sup>

## (二) 城市功能的转化

现代城市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城”和经济意义上的“市”双重功能,同时兼具文化、消费、人口聚集等多种功能。但是,辛亥革命前山东的城市多是政治性的城市,“城”与“市”是一个不平衡的倾斜组合。其“城”的分量远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明显附属于“城”。“市”因“城”而繁荣,大多数的商业活动都围绕着官府与士绅阶层的需要展开,带有强烈的自给性和封闭性色彩,属于消费性的城市,商业集中于消费服务性行业,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为主。如辛亥革命前的济南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城市,其消费者主要是县、府、道、巡抚衙门等各级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济南府院试或全省乡试期间集中于此的大批士子;驻济南的军卫官兵;应差出役的各县公私人员以及僧、道和星相医卜等;再就是城市普通居民和手工业者。商业主要是以满足上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为主。从行业结构看,主要集中于消费服务性行业。以及与普通居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日用杂货业、铁货业、京货业、漆业和洋广货业等。济南在城市经济方面表现出对农村经济的高度依赖性,济南与周边乡村之间的城乡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贸易关系,城内居民的生活资源主要依靠乡村供给体系提供。济南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大多来自城市近郊及周边地区,与国外市场基本没有联系,与外省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长途贩运和远距离流通较少。

辛亥革命后,山东城市功能转变逐渐深化,由单一政治中心城市向多元功能城市转化。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城市的发展,很多城市由原来功能单一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产地市场、集散市场,成为有着广泛联系的区域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如济南不再仅是一座政治性的城市,而是成了连接内地市场之间、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纽带,传统商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市场由封闭转为开放,缓慢地向现代市场转型。原先仅限于本地贸易的传统市场,开始与国际市场发生联系,进出口贸易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进出口贸易的货值整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济南市场长期以来所具有的封闭性、地域性色彩开始消褪,向“开放之市”加速转型。城市中的近代工业发展提速,据统计,1912年到1927年,济南共有大小企业241家。<sup>[14] P332</sup>1930年到1934年,济南新设工厂48家,较大的工业企业共有137家。<sup>①</sup>

除单一政治中心型的城市向多元功能型的城市转化外,一些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城市也开始向多元功能型的城市转化。辛亥革命前,青岛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要经济结构的城市。这一时期,青

岛只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而不是生产基地。作为一个商贸型的城市,此时的青岛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大,城市带有较典型的依附性和寄生性。辛亥革命以后,青岛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逐渐发生变化,社会资本不断地向工业转移,青岛的华商资本制造业发展起来。1919年,青岛华新纱厂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青岛有针织厂6家,资本4.4万元。1924年,青岛成立恒兴面粉公司。1928年,又成立双蚨面粉公司。<sup>[6] P221-222</sup>在机器制造业和机器维修业方面,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华商设立的各种铁工厂有17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华昌铁工厂有工人100人,车床16台,铣床3台以及刨床、钻床、卷板机等。<sup>[7] P473</sup>到20世纪30年代初,青岛的机器工厂已达101家,资本总额22653万元;手工工场1603家,资本总额240.7万元;商店7143家,资本总额10619.7万元;银行12家。<sup>[14] P663-665</sup>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拉力增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急剧加快。包括工人、资本家、知识分子在内的新青岛市民群体开始形成。新的职业、新的生活方式促使青岛的城市功能逐渐发生变化。青岛不仅吸引了山东各县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人口,也吸引了与当地贸易关系密切的其他省份的人口以及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前来投资、贸易、居住,这使青岛逐渐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为满足城市人口增加的需要,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新式建筑,如百货商场、工厂、仓库、银行、教堂、医院、学校等。为方便居民的生活,城市的市政工程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如马路的修筑、电灯的架设、电话的安装、自来水的铺设等,都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功能出现了分区化趋向,居民区、商贸区与工业区逐渐分离。居民区中,富人区与贫民窟也逐渐分离开来。辛亥革命后,济南城乡分治步伐加快,1929年7月,济南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市政建设非常重视,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很快。到1930年9月,济南完成了11355米的道路翻修改造工程,同时还对妨碍交通的旧城门进行拆迁改建,拓宽路面,以利通行。济南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末济南城市的主要客运工具是人力车,1917年济南出现了汽车客运。到1927年,济南共有汽车客运公司11家,客运汽车28辆。城市的公共照明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体现。1926年,济南城区各大商号陆续在公司驻地街道安装路灯,1929年11月济南全城共有路灯1136盏。1935年,济南设立路灯专线,在主要干道都安置了路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供水压力增大。1934年4月,济南市开始筹划自来水公司,建设城市供水系统。1936年12月,济南第一个自来水水厂建成正式供水。辛亥革命后,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化,为公众服务的各种公共建筑或公共设施也应运而生,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火车站等为城市生活的多样化提供了物质条件。<sup>[13] P330-355</sup>在青岛,自1922年中国收

①《市政月刊》第10卷第7、8期合刊,1936年8月《济南市志资料》第3辑,第58页。

回青岛以来至 1928 年 6 月,补修、翻修、平垫、新建各种道路约 820 万平方米。在供水系统方面,自 1925 年至 1928 年上半年,青岛市新辟水源砖井 6 个,管井 4 个,日供水量最高时达 1 400 余吨,年供水量增至 410 万吨。自收回青岛的短短五年里,青岛出现了兴办中高等教育的热潮,先后设立各类中等学校 9 所,另有新设教会中学 2 所,青岛病院附设医学校 1 所。1924 年春,青岛中国青年会筹设平民读书处 10 余所。1924 年商埠督办公署创办“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同时成立“公立通俗图书馆”,购置各类图书,供民众借阅。30 年代初,通俗图书馆改为民众图书馆,另设市立图书馆和巡回书库。青岛收回以后,医疗事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青岛公立市立医院下设 6 个分院,3 个诊疗所;私人及教会团体设立的医院达 40 余处,具有相当规模的有 20 余家。<sup>[14] [P447-501]</sup>从以上济南、青岛等地的市政建设、文化设施、公众娱乐场所的发展情况来看,辛亥革命后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思想意识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城市的功能逐渐在发生变化。

### (三) 城市社会阶层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了城市社会分层化,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昔日封闭的身份等级结构被突破,城市社会结构开始向以功能职业为基本标准的近代社会分层结构转变,由职业、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权力与声望等差距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城市新精英队伍出现以及各社会集团发生了分化重组。在迅速发展的城市里,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相互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了的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本家阶层。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相应的一些新的职业和阶层应运而生,出现了教育界、新闻界、金融界、政界、科技界、文化界等形式和内涵均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职业领域,产生了市政管理人员、出版家、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西式医生等新职业。

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辛亥革命后,城市精英们的权力增长了,他们对政府机关的影响较革命以前也大为提升。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sup>[15] [P397-846]</sup>城市精英的发展加重了其与士绅的分裂,同时也扩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源。随着城市精英队伍的扩大,他们在政府、议会以及商会中的席位逐渐居于优势,并取得支配地位,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由于他们政治势力强大,经济实力雄厚,与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外国政治经济势力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由于绅

士阶层的衰落,资产阶级成为城市精英中占优势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些城市精英无疑是辛亥革命后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产物,是“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旧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sup>[15] [P854]</sup>。

辛亥革命后,由于教育、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山东的新知识分子队伍也得到发展,城市中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加,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这时逐渐形成。有人估计到 1916 年,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的学生人数已占山东总人口的 1/75。<sup>①</sup>新的力量集团在逐步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的同时,日益凸现社会主导性角色,并被人们寄予改造社会的厚望。1919 年当中华民族的权益再次面临威胁时,这些新生力量便无所畏惧地挑起了挽救危亡的重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已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城市文化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的主体。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多以公务员、职员、编辑、记者、教师、律师、医生为职业,具有某项专业技能,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他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城市行政、工商、市政管理、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日益显著。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城市逐步兴起,城市中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15 年山东现代产业工人共 24 774 人,1916 年则达到 39 971 人,其中男工 17 795 人,女工 22 176 人。<sup>[16] [P415]</sup>产业工人属于城市社会的中下层群体。除了产业工人外,城市社会下层群体还有以修理匠、铁匠、理发匠、店员、伙计、学徒等人构成的劳工群体,由马车夫、人力车夫、街头摊贩以及建筑、运输、装卸、清洁等行业季节工、临时工构成的苦力群体,由难民、乞丐、娼妓、艺人等构成的游民群体。城市社会下层群体占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大都未受过教育,缺少文化知识,缺乏熟练技艺,谋生手段少,只能靠出卖苦力和其他谋生手段维持生存。他们有的收入微薄,勉强养家糊口;有的生活无保障,生存艰辛。

辛亥革命后,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已不再是“士农工商”四民类别,而是代以农业、矿业、工业、商业、自由职业、公务员、教员等几大类,城市职业分类出现专门化、多样化和细致化。城市居民逐渐被纳入到正规化的职业体系中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明显增加。以 1927 年济南为例,是年城区及近郊有 297 308 人,其中,在业人口:96 785 人,占 32.55%;农业人口:149 892 人,占 50.42%;学生:26 141 人,占 8.8%;无业人口:24 490 人,占 8.2%。在业人口中:议员、官吏 173 人,公务员 1 842 人,教员 116 人,医生 264 人,新闻记者 40 人,律师 24 人,矿

<sup>①</sup>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405页。

业 19 人,工业 30 268 人,商业 10 057 人,牧业、渔业 15 人,苦力 31 719 人,娼妓 438 人,其他 21 810 人。<sup>[17]</sup> 1936 年,济南城市人口职业分布情况是:公署局所 34 073 人,监狱 641 人,团体 12 081 人,学校 28 139 人,工厂 6 623 人,金融业 1 041 人,寺庙 255 人,教堂 3 408 人,公共场所 313 人,娱乐场所 174 人,报馆 44 人,通讯社 41 人,商号 60 758 人,农业 145 916 人,乐户 947 人。<sup>①</sup> 根据上面的数据,1927 年济南工商界人口是 72 063 人,占城市人口的 24.24%,政界人员只有 2 015 人,占总人口的 0.7%。这说明,济南的城市人口中的消费性人口逐渐减少而生产性人口日渐增加,劳工阶层逐渐壮大,并构成了城市下层社会的主体,济南已经从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开始向多职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现代城市演变。

从 20 世纪 20 年代青岛市居民的职业分布状况也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城市社会阶层变化的一些情况。据 1928 年北平社会调查部的统计资料,当时青岛人口有 264 735 人,其中公务员 2 491 人,军人 1 332 人,警士 1 232 人,教员 384 人,学生 5 357 人,新闻界 92 人,医士 87 人,律师 25 人,农业 64 348 人,工业 23 765 人,商业 30 038 人,渔业 10 159 人,交通员 155 人,矿业 55 人,劳力人 12 157 人,妓女 269 人,其他 3 963 人,无职业 108 871 人。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城市人口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产业工人的数量增加很多,城市中间阶层的职业日趋多元化,社会管理服务人员逐渐增加,公务员、军人、警士、教员、学生、编辑、记者、医士、律师开始成为城市社会的重要成员,城市人口的职业日趋复杂化、多样化。<sup>[18]</sup>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山东社会变迁具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与山东社会变迁的历程互为表里,制约着山东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首先,山东社会的变迁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的山东社会变迁范围广阔,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教育、思想观念、城市、乡村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显示的变迁带有整体性特征。其次,山东社会的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如同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一样,山东社会变迁的不平衡也十分明显。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迅速的城市如济南、青岛的社会变迁的速度较快,而广大农村的社会变迁则显得较为缓慢,存在着明显差距。再次,山东社会的变迁具有复合性。在山东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与分散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并存,工业发展与传统农业生产并存,社会化的、开放式的生活方式与封闭停滞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存,新的利益集团与旧的宗法组织并存,等等,使得山东社会的变迁具有明显的复合性特征。又次,山东社会的变迁具有相当的缓慢性。辛亥革命后,山东大部分时间处于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天灾不断,社会动荡,缺乏一个持续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有利环境,延滞了

山东社会的变迁。最后,山东社会的变迁具有一定的被动性。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形式有自发性和被动性两大类型。被动性变迁不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压力下,被迫中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被动地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辛亥革命爆发后,山东社会加速向现代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外国因素的影响(如军阀混战、“一战”等),因而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总之,辛亥革命后山东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趋向有了极大的跃进,但却无法稳定持续演化。

#### 参考文献:

- [1]张公制.曾经统治过山东的几个军阀(上)[G]//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 [2]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M].长沙:岳麓书社,2004.
- [3]吕伟俊,等.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1840-1949)[M].济南:齐鲁书社,2002.
- [4]山东省地方政权沿革丛书编纂委员会.山东省行政体制沿革[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 [5]安作璋.山东通史(近代卷,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 [6]刘大可,张照东.山东经济史(近代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
- [7]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彭益泽.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G].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王效熹.抗战前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G]//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 [10]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南市志(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1]安作璋.山东通史(近代卷,下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 [1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 [13]聂家华.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1904-1937)[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14]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15]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16]安作璋.山东通史(现代卷,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 [17]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南市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8]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陈东霞

<sup>①</sup>参见《济南市政统计》,山东省档案馆 J115-05-97。

#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 **Research on Xinhai Revolution and Social Change of Shandong Province: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Xinhai Revolution**

LIU Da-ke

( History Researching Institute ,Academy of Science of Shandong ,Jinan 250002 ,China)

Xinhai Revolution ,breaking out in the year of 1911 ,overthrew the tyranny of Qing Dynasty ,set up Republic of China and meanwhile it enhanced the consciousness of democracy and the concept of republic and democratic. Since then China has transit preliminarily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one ,which was led to a modern-society-developing orbit and was proved to be a great era-significant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Xinhai Revolution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change of China and greatly influenced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 education ,media ,regional cities ,civil life and social space in Shandong to pave for modernization. Although met with many difficulties ,the society in Shandong was filled with many turning points and headed for the way of developing Shan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 **Key “Mistranslation” and Purposeful “Misreading”**

ZHANG Hui

(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Hong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Kong 999077 ,China)

In his translated version of Uncle Tom’s cabin ,Lin Shu seemed to leave three critical mistranslations including translating the same names in different ways ,deleting and reducing Christianity and refining title translation “yutian”. By this he created a new image of Tom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work. However ,we should deem that it is not faulty expressions but purposeful “misreading” ,and that Lin adopted this kind of purposeful mis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wake Chinese at that time. Actually ,propelled by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restricted by social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Shu had to change and rewrite some parts of original versions to fulfill readers’ reading habits and appreciations at that era. Nevertheless ,he also gradually understood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innovated Chinese fictions through selection ,adoption and absorption ,which cultivated modern translation conception consequently.

## **On the Complementary Mechanism of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Commercial Press**

WANG Jia-rong

(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100710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Commercial Press ,Xia Ruifang ,Zhang Yuanji and Gao Mengdan were the core leaders of this famous publishing house. Among them Zhang Yuanji was the soul of the press. Xia Ruifang was good at doing business yet magnanimous. Gao Mengdan combined sincerity with flexibility when dealing with social events. These three managers were all characteristic ,but each of them was complementary to the whole being.